

李歐梵回憶起在哈佛的教學生涯中每有成就時，那種喜悅真是溢於言表。他總結在哈佛的教學經驗，覺得感受最深的是學生的人情味。這些學生多年的關切，令他保持心理年齡永遠年輕，有時還覺得自己是學生。

也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所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不亦樂乎」這句話，我終於在這種小班上體會出來，雖然我教的英才不多。每年還不到五六個，這也足夠了。(頁131-32)

這一連串「意識流」式的回憶，令我深深感覺到十年來在哈佛的教學經驗還是寶貴的。當然在現代文學方面，我訓練出來的博士也個個出人頭地，令我欣慰，然而更令我懷念的反而是這些「不倫不類」甚至「不務正業」或不夠專業的碩士生和本科生，他們在我的啟發下各發異彩，這才是我最引以為榮的教學經

驗，也因此導致我最終走向文化研究的道路。(頁134-35)

他總結說：

如果我需要總結在哈佛的教學經驗，感受最深的是學生的人情味。……有人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我恰得其反，沒有做成父親，卻終生交到不少朋友，這些學生多年的關切，令我保持心理年齡永遠年輕，有時還覺得自己是學生，甚至到我退休的時候更覺如此。這是我保持「青春常駐」的秘訣。(頁157)

鑒別「文本」的新維度

● 陳愛中



耿傳明：《輕逸與沉重之間——「現代性」問題視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學》(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儘管近幾年來關注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就新文學研究領域而言，「新浪漫派」依然是一個相對新鮮而陌生的詞彙，對於組成這個流派的徐訏和無名氏兩位作家的認識，恍若隔世仍然是讀者無法擺脫的第一觀感。就歷史現場而言，實際上「新浪漫派」文學曾經在上個世紀的

40年代創造了洛陽紙貴的閱讀奇跡，作品以離奇的情事情節、濃厚的意境渲染和獨特的人物構造引致諸多善男信女們的頂禮膜拜，以至於1943年被稱為「徐訏年」。囿於特殊的時代環境，「新浪漫派」文學在很長時間內遭到社會主流話語的冷落，恍如雨後彩虹，瞬間的五彩斑斕過後落入了長久的消隱和沉寂。應該說，在讀者接受的趨之若鶩和闡釋研究者的冷眼旁觀之間所營構的不均衡態勢，造成了關涉「新浪漫派」研究頗為尷尬的局面，也是新文學研究中頗為令人遺憾的現象。南開大學教授耿傳明的專著《輕逸與沉重之間——「現代性」問題視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學》（以下簡稱《輕逸與沉重之間》，引用只註頁碼）的面世，從嶄新的研究視野出發，立足於完備的文本資料分析，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這種尷尬局面。

首先，本書較為完善地建立了「新浪漫派」文學研究的較為自足的、邏輯嚴謹的闡釋體系，為隨後的研究提供了前提基礎和理論支持。在現代闡釋體系下，對一個流派或者文本的解讀和接受是否成熟，是否真正在批評學的意義上進入到闡釋對象的本體，其中一個關鍵性的標誌就是是否建立了自足而邏輯嚴謹的闡釋體系，從而建構其相對獨立的審美原則、邏輯嚴謹的話語體系和富有特色的切入視點。在這個層面上，有關魯迅的啟蒙哲學、老舍的市民文化、沈從文的邊城世界乃至馮文炳的禪學人生的研究，都成就斐然。雖然隨着各種遮

蔽因素的煙消雲散，「新浪漫派」逐漸進入人們的閱讀視野，其內在的價值逐漸被人們所重新認識，但這些都無法掩飾星光片羽的闡釋事實，要麼停留在單純的文本解剖，要麼是單一問題的自足圖解，就連「新浪漫派」的定義本身都存在諸多的爭議，出現了諸多的命名方式，如後期現代派、頹廢浪漫派、後期浪漫主義乃至消極浪漫派等等，不一而足。

面對兩位作家能否構成流派的爭論，作者認為在抗日戰爭大背景下，徐訏和無名氏雖然在「主觀上缺乏形成一個流派的企圖，但客觀上卻的確形成了一個流派」。在縱覽眾多關於這個流派的命名內涵後，本書詳盡而深入地論述了「新浪漫派」的流派內涵，從創作方法、文學價值理念和作品構成等眾多側面梳理了其作為一個流派所必備的內在質素。命名作為建構現代闡釋話語的前提條件和關鍵組成部分，其內涵的深入論證和最終完善為新的闡釋體系的建構提供了可能。

從定義的學理分析出發，《輕逸與沉重之間》在完成了對「新浪漫派」闡釋體系的基本話語元素的釐定後，以「現代性」的理論視點為切入視角，融合了傳統知人論世的評述方略，用「輕逸與沉重之間」的語詞很好地概括了「新浪漫派」的文學主題選擇與時代主流話語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通過對《無名書》所作的「解剖麻雀」式的細緻入微的分析，理論的抽象和文本的具象恰當地糅合在一起，相得益彰。

就新文學研究領域而言，「新浪漫派」依然是一個相對新鮮而陌生的詞彙，在讀者接受的趨之若鶩和闡釋研究者的冷眼旁觀之間所營構的不均衡態勢，造成了關涉「新浪漫派」研究頗為尷尬的局面。《輕逸與沉重之間》的面世，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這種尷尬局面。

雖然隨着各種遮蔽因素的煙消雲散，「新浪漫派」逐漸進入人們的閱讀視野，其內在的價值逐漸被人們所重新認識，但這些都無法掩飾星光片羽的闡釋事實，就連「新浪漫派」的定義本身都存在諸多的爭議。

著作的最後將「新浪漫派」文學所彰顯的現代性問題，放在「現代性與現代文學」的宏觀格局中進行系統總結，從而在相關研究的歷史視閫中規範了「新浪漫派」文學的價值定位。應該說，就體系闡釋的建構而言，《輕逸與沉重之間》所建立的理論構架模式和文本解讀思維在整體意義和敘述模式上為「新浪漫派」的文學闡釋提供了範本，系統而扎實地將「新浪漫派」文學從流派的角度提供了範式思考。

其次，是現代性闡釋視角下的價值重述。毫無疑問，匠心獨運的情節懸念設置、形而上的情愛觀念這些通俗文學所必備的元素是「新浪漫派」文本所青睞的敘述內容。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種所謂的「俗」恰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為「新浪漫派」文學帶來閱讀上的「狂歡勝境」，以至於其中的一些作品在報紙上連載的時候，獲得萬人空巷的美譽，讓讀者在剎那間忘卻了戰火交併的血雨腥風。另一方面，也正是這種「俗」，在很大程度上以喧賓奪主的姿態遮蔽了「新浪漫派」內在深層文學價值的彰顯，阻礙了人們對「俗」背後所蘊藏的「雅」的解讀，而缺少後者意義的風韻恰恰是「新浪漫派」文學史意義和文學性認知的瓶頸所在，「新浪漫派」從抽象的定義到具體文本的評析之所以充滿爭議，其根源也恰恰就是在這裏。

文學的現代性問題是一個關涉到新文學的發生資源、身份釐定乃至於價值規範重新洗牌的關鍵性、根本性話題。《輕逸與沉重之間》

從中國近現代文學獨特的語境出發，將現代性歸結為「信念式、終結性的『現代性』態度」、「生活化、感受性的『現代性』」和「浪漫主義的『反現代』的『審美現代性』形態」三種內涵，獨樹一幟，頗有創建（頁18-20）。作者認為在這種特定的「現代性」內涵的感召下，「新浪漫派」文學映襯出了「現代性」文化中的諸多典型問題，比如「超越主客體的對立，拓展人的生存的精神空間，提升人的生存境界的問題」，而且以其豐碩的創作實績打破了新文學對「現代性」想像的慣用模式，引導人們從相反的側面去反思傳統現代性的理想主義色彩、現代時間進化觀念等常識式的理念，在一定意義上呈現為所謂的「反現代性」的哲理內涵，以達到「讓人們意識到他們所想像、憧憬的現代社會可能是一個高風險的社會，那些一廂情願的『現代性』想像、設計只是人們的夢想而已。」（頁232）的深邃思考。

應該說，《輕逸與沉重之間》對「新浪漫派」文學的「現代性」問題思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先前批評視閫對文本表象的敘述情節的單純關注，凸現了「新浪漫派」文學在建構新文學「現代性」身份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從而在文學史的意義上尋找到久已失卻的應有的歸宿意識。應該說，激烈而「整體」反傳統是新文學現代性身份內涵的重要途徑。對此早在上世紀80年代，台灣學者林毓生就曾系統地表達過這種理念，認為新文學很大程度上在整體意識上將傳統作為自我建構的對立

面，從而人為地中斷了在設計標示「現代」的華美服裝時對傳統資源的汲取，從而呈現為某種程度上的「斷裂」的現代性，也從根本上制約着新文學民族性的建構。這種觀點後來成為學術界頗為流行的說法。

但實際上，傳統文學的「集體無意識」身份是很難在短時間之內抹煞的，它的影響也勢必會或多或少地影響到新文學的創建，《狂人日記》、《荷塘月色》等諸多新文學作品都透露出濃重的傳統文學的痕迹。這樣，理論意識和創作實績的二律背反決定了新文學闡釋面對傳統文學資源時的複雜心理。《輕逸與沉重之間》很好地掌握了這種闡釋平衡，通過對「新浪漫派」文學的詳觀細察，敏銳地梳理出傳統文學資源的潛在影響，同時又透析出西方文學的薰染。

作者認為，「新浪漫派」文學在追逐現代性的過程中遵循的是一種文化相對主義觀念，從而迥異於社會主流話語的西化傾向，將中國傳統文化放置在與西方文學相等價的位置上來觀察中西文化的差異，在「天人合一」哲學的引領下，試圖遵循儒家和禪宗的思維理念來重建新文學的傳統色彩。著作對這種哲學觀的發現，實際上為近現代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指出了另外的路途，顯得尤為重要，標誌着傳統認為的新文學想像內涵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從而在倫理敘述上，改變了傳統文學在新文學領域內的負面象徵。這一發現，一方面重塑了「新浪漫派」文學的價值形象，另一方面也在很

大程度上修飾了舊有的文學史觀念，為文學史的寫作作了「糾偏」的努力。

再次，是對《無名書》文本的綜合而深入的闡釋。毫無疑問，《無名書》是「新浪漫派」文學的重要作品，其理論思考和人物構圖在整體上代表着無名氏的巔峰成就。由於此書先前並沒有在大陸完整地出版，讀者很難睹其全貌，對其的完善闡釋和深度的價值闡發一直是研究的薄弱環節，許多地方仍有諸多空白點。《輕逸與沉重之間》對《無名書》的成因、創作軌迹乃至人物內涵的構塑都作了詳盡而扎實的分析，成為至今為止對於該部重要作品分析的權威闡釋者。作者從《無名書》出現的時代語境出發，探討了「現代性」的文化危機，認為《無名書》選擇「不同於時代歷史寫作的獨特的人文視角」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流行於時代的政治救世主義的「解放話語」，去關注「涉到個體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問題」，從而營構出獨特的「關乎個人的自我實現的拯救話語。」（頁113、118-19）

很顯然，理性主義的研究是新文學研究的重要線索，在考察先前關涉《無名書》的理性主義研究的視閥時，《輕逸與沉重之間》認為將《無名書》所宣揚的生命哲學與柏格森 (Henri Bergson) 的生命哲學混為一談，從而將無名氏界定為「非理性主義」的「現代主義」作家，這在很大程度上誤讀了《無名書》的真正內涵。事實上，無名氏生命哲學的內涵「主導傾向是中國傳統的以生存為根基和中心、以人生來發明天

《輕逸與沉重之間》對「新浪漫派」文學的「現代性」問題思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先前批評視閥對文本表象的敘述情節的單純關注，凸現了「新浪漫派」文學在建構新文學「現代性」身份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從而在文學史的意義上尋找到久已失卻的應有的歸宿意識。

《無名書》是「新浪漫派」文學的重要作品，但它並沒有在大陸完整地出版，讀者很難睹其全貌。而《輕逸與沉重之間》對《無名書》的成因、創作軌迹乃至人物內涵的構塑都作了詳盡而扎實的分析，成為至今為止對於該部重要作品分析的權威闡釋者。

命的『生命哲學』。是一種『生生之謂易』的『天道』之學，屬於一種『參天地贊化育』、『天人合一』的『道問學』的中國哲學傳統。」(頁5) 通過《無名書》，無名氏實現了對「西方非理性的欲望中心主義的超越」。該書將研究《無名書》的「時代意義」歸結為「在傳統文化的神聖性為『現代性』脫魅之後，重建文化傳統的『神聖性』的努力。」《無名書》「所破解的正是現代性文化最深的內核，即主客二元對立的唯物論」(頁141)，試圖從另外的途徑重建人的生存意義與價值世界。

俄國批評家佩列維爾澤夫 (Valerian F. Pereverzev) 在《俄國

現實主義長篇小說之源》中通過對俄國文學史上的「失蹤者」的探尋和發掘，為俄羅斯文學理論體系的整體構築提供了可能，從而為他後來構造《形象詩學原理》的理論譜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得以從文本的現實出發還原俄羅斯文學的真實場景。近幾年來，新文學也掀起了尋找「失蹤者」的熱潮，應該說如何尋找很簡單，只要回歸到文本創作的現場，應該都不是甚麼難事。問題在於，尋找後如何闡釋，如何定位才是重要的。在這方面，《輕逸與沉重之間》無疑給我們樹立了發現和鑒別新文學「文物」的樣板。

制度建設與學科發展

● 王建偉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桑兵曾在〈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史學會〉一文中，論及近代史家對自身的史學會歷史的認識不夠清楚，「近代史家治史，首在求真，可是對於自家的歷史，似乎不夠重視，有關史事，鮮有論及；即使有所論列，也是言人人殊。」(桑兵：